

古代军事水利工程荆州“三海八柜”的兴废及其反思

徐文武 彭文璟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荆州“三海八柜”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军事水利工程,始建于三国时期,后经历代反复拆毁与重修,至元代彻底废弃。“三海八柜”的兴废反映了人水关系由原始和谐、冲突再到趋于理性和谐的发展趋势,而人水关系与不同时代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荆州;军事水利工程;三海;八柜;兴废;人水关系

分类号:E9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8)06-0023-04

在中国古代,江河湖泊不仅可以用于通航,还可以作为天然屏障用于军事防御。荆江流域江河纵横,湖泊棋布,水资源十分丰富,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物产,为水运交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河湖港汊还被利用起来,作为军事防御的屏障,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海八柜”就是利用荆江以北河湖港汊修建的重要军事水利工程,它通过阻截水流,在地势低洼的地带形成大型的水体,以此来阻隔敌军的入侵,起到军事防御作用。“三海八柜”自三国时期开始修筑“北海”,后经过历代毁弃与重修,至宋朝增修“八柜”,直至元初彻底废弃,前后存在近千年,对荆州的军事防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三海八柜”的兴废

荆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在《三国志·蜀书》中,诸葛亮对于荆州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1](P576)}因此,荆州在三国时期成为魏、蜀、吴三方军事争夺的焦点。赤壁大战后,孙刘联军大败曹魏军队,从曹魏手中夺取对荆州的掌控权。此后,荆州先后由西蜀和东吴掌控,成为北拒曹魏的重要战略据点。孙吴守军驻守荆州时,为了阻隔曹魏军队南犯,阻截沮漳河水,引入荆州以北的低洼地带,形成巨大的水面,形成以水御敌的军事工程,这便是“三海”的肇始。

魏癸未四年(263年),曹魏灭蜀汉,三国鼎立的局面不复存在。两年后司马炎代魏自立,建立西晋,大有一统天下之势,弱小的孙吴岌岌可危。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西晋进攻孙吴,镇守荆州的吴国大将陆抗命令守将张咸筑堰积水以御晋军。《三国志·吴书·陆抗传》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中,以绝寇叛……(羊)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损功力。”^{[1](P1356)}这段史料交代了陆抗修筑“北海”的缘由。晋将羊祜率军攻打江陵,而江陵地势平坦宽广,道路便利通畅,如果不采取措施,晋军长驱直入,江陵城将岌岌可危。陆抗命江陵都督张咸筑大堰阻遏沮漳河水,并将水引到地势低洼的地方,用以阻止晋军南下。至此,“荆州三海”中的“北海”初具规模。

西晋至唐朝,“北海”工程被泄水填田。西晋统一后,“北海”作为军事防御的功能减弱,于是人们便将“北海”的部分地方开垦为良田,用于农业生产。隋朝时,由于地势低洼,“北海”经常受涝。至唐朝战事平息,政局安定,“北海”的防御作用进一步减弱。据《新唐书》记载:“初,江陵东北傍汉有古郭,不治,岁辄溢。皋修塞之,得其下良田五千顷。”^{[2](P3582)}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卷七十八“三海”条补记云:“唐贞元八年,曹王皋为荆南节度。江陵东北七十里,有废田,傍汉水,古堤决坏者二处,每夏则水浸

收稿日期:2018-09-22

基金项目: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科研基金(2017H06005)

第一作者简介:徐文武(1964—),男,湖北洪湖人,教授,主要从事荆楚文化研究。

溢,皋始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盖即北海故址。”^{[3](P2670)}由于长期无人治理,每到夏季,“北海”经常出现水流漫溢的现象。为了防止更严重的涝渍,荆南节度使李皋将原来储水的“北海”全部筑堤围垦,填为良田。

五代十国时期,高季兴据守江陵城,建荆南国。为了防止荆南国被他国兼并,荆南国重建“北海”,以御外敌。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荆南国已呈衰落之势,而中原的后周日益强大,荆南王高保融为了防范中原王朝吞并荆南,“自西山分江流五六里,筑大堰”^{[3](P2670)},在纪南城北决江水,蓄积七里多宽,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北海”得以重建,又开始发挥它的防御作用。

北宋建立后,加快了统一全国的步伐,荆南国不得不对北宋王朝俯首称臣。为了达到兼并荆南国的目的,宋太祖赵匡胤下令撤除“北海”工程。据史料记载,北宋建隆二年(961年),荆南王高保勖派遣其弟高保寅前往北宋进贡。宋太祖赵匡胤要高保寅回荆南后传旨将“北海”的水放掉,这样南下荆南就一路畅通了。“太祖常令决去之,盖保江陵之要害也。”^{[4](P12093)}赵匡胤要求填“北海”,从表面看是为了使南下荆南的道路更加畅通,实际上是为了防止高保勖以“北海”为险阻,妨碍北宋对荆南国的军事行动,可见“北海”的军事作用是很大的。当时荆南尚未归宋,不受约束,所以没有放北海之水。不久,赵匡胤又命出使湖南的司天监赵修已再度传旨,命令高保勖拆毁“北海”工程。迫于北宋的强大压力,“北海”工程又一次被拆除。

“三海八柜”工程的大规模兴建是在南宋时期。南宋王朝偏居临安(今浙江杭州)一隅,位于长江中游的江陵城先是成为与金人对峙的前线,后又成了阻止元人南下的重镇。一旦江陵失守,敌军顺江而下,临安的安全就没有保障了。为了守住江陵,南宋守将在“北海”的基础上,打造了规模更为宏大的军事水利工程“三海八柜”。

宋王朝南渡以后,金人不断南犯,南宋局势日趋紧张。这一时期,荆襄地区由于处于南宋王朝防御体系的中心,位于长江中游的江陵,利于防守、交通便利,在宋金对峙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南宋守将在倚仗江陵城作为军事防御工程的同时,开始兴建“三海”工程,以此作为江陵城的外围防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南宋守臣李师夔为了防范金兵,重开五代时高氏所筑之“北海”,并在“北海”以外,扩建上、下海,“三海”工程初具规模。

嘉泰年间(1201年—1204年),湖北安抚史刘甲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扩筑为上、中、下三海,绵亘四十里。据《宋史·刘甲传》载:“甲谓:‘荆州为吴、蜀脊,高保融分江流,渚之以为北海,太祖常令决去之,盖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遗址浚筑,亘四十里。”^{[4](P12093)}刘甲认识到“北海”的军事防御作用,认为北宋时太祖下令拆毁“北海”工程,是因为“北海”工程对于保卫荆南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宋金对峙的局势下,江陵地位尤为重要,刘甲扩筑“三海”便是希望它能充分发挥其军事防御作用。

继刘甲重修“北海”、扩增“三海”之后,荆湖北路安抚使吴猎担任江陵知府时再次重修“三海”,并增筑“八柜”。开禧二年(1206年),宋金开战,金人南犯襄阳,江陵告急。据《宋史·吴猎传》记载:“猎计金攻襄阳,则荆为重镇,乃修成‘高氏三海’,筑金鸾、内湖、通济、保安四匱,达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匱,达于下海;分高沙、东奖之流,由寸金堤外历南纪、楚望诸门,东汇沙市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遏走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置李公匱,水势四合,可限戎马。”^{[4](P12085)}其中的“四匱”之“匱”,是“柜”的古字,在此处指供军事用的蓄水池、水库。《宋史·张浚传》记:“凡要害之地,皆筑城堡。其可因水为险者,皆积水为匱。”“匱”又称为“水柜”,指四周高起以蓄水的地方。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会通河道记》:“闸河西旧有湖,周六十五里,有闸四,堤口六,明永乐时创之为水柜。”《宋史·吴猎传》将吴猎增修“三海八柜”的原因和具体位置都交代得很清楚。金兵南下,吴猎估计金人将攻打襄阳,军事重镇荆州受到威胁。为了阻遏金兵的进攻,便在“三海”的基础上再修筑金鸾、内湖、通济、保安四个水库,沟通“上海”和“中海”;筑拱辰、长林、药山、枣林四个水库,通于“下海”。“三海”虽然互相分离,却又是上下贯通,而“八匱”在沟通“三海”的同时,也用于储水以备不足,“三海八柜”的形制就此固定下来。吴猎还围筑南海、李公柜,由于东面还是尚未开垦的水域,这样江陵四面都有水流环绕,形成一个环状的军事防御带,完全可以将金人的骑兵阻隔在外。金兵进犯荆门时,得知江陵有“三海”作为军事防御,便不敢贸然进犯。继吴猎之后,嘉定四年(1211年),赵方升任直焕章阁兼任江陵知府,再次“增修三海八匱,以壮形势”^{[4](P12204)},“三海八柜”更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南宋后期,宋元战争爆发,荆襄地区再度成为对元防御的前线,江陵的军事地位更加凸显。南宋王

朝将大批军队车马集结于江陵,以抵御元军南下。在这种情势之下,本应加强“三海八柜”的建设,但时任制置使兼营田大使赵范为了供给大量的军用粮资,将“三海”的部分区域重新围垦为田,以供军需。加之当时人地矛盾较为突出,豪民广泛占夺诸海,军官借屯田之名行侵占土地之实,“三海八柜”工程又一次废弛,失去了军事防御作用。端平三年(1236年)襄阳守军叛降蒙古,元军迅速南下,没有了“三海八柜”的保护,江陵城周边受到重创。资政殿大学士魏了翁奉命到江陵府考察后,向朝廷上疏《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柜》,痛陈由于疏于管理,“三海”淤积成田失去防御作用的危害,并请求修复三海八柜。^[5]但因为当时元军已经攻至江汉平原腹地,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宋元两军一直处于拉锯战的状态,修复“三海八柜”的工程因此搁置下来,直到南宋名臣孟珙担任江陵知府时,才将修复“三海八柜”的工程重新付诸实施。

据《宋史·孟珙传》记载:淳祐五年(1245年),“珙至江陵,登城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敌一鸣鞭,即至城外。……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因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匱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4](P12369)]孟珙认为,江陵正是凭借“三海”作为军事防御,而现在却沧海变为桑田,敌军可以一路南下长驱直入,这样江陵在御敌上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于是为了加强江陵城的军事防御体系,他再次大规模扩建“三海”,将沮漳水人为改道,绕城而东流经扬水,再汇流入汉水,形成一片辽阔的水域,从远处看宛如一片湖,这样使得“三海”贯通为一,并且随着水势的高下,修筑蓄水池来调节,将江陵城置于一个巨大的水体屏障之内。

事实证明,重修“三海八柜”对于抵御元军的进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元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元军攻破襄阳。因为江陵有“三海八柜”的阻隔,元军没有继续南下,而是顺汉水向东占领了鄂州。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灭金后南下攻荆南,由于天大旱,“三海”干涸,恃水为防的江陵失去了屏障,被元军攻破。同年五月,忽必烈任命廉希宪为荆南行省平章政事,坐镇江陵。廉希宪到任后,下令掘毁“三海八柜”工程。据《元史·廉希宪传》记载:“江陵城外蓄水捍御,希宪命决之,得良田数万亩,以为贫民之业。”^[5](P3094)]至此,失去了防御作用的“三海八柜”再次被围垦,改造成良田万亩。

二、“三海八柜”兴废的反思

荆州自三国时期修“北海”始,经历各代的毁弃与重修,至宋朝增修“八柜”,至元初最后一次废弃。纵观“三海八柜”的屡兴屡废,它反映的是人水关系由和谐、冲突到趋向理想和谐的一个发展过程,而人水关系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关系。

三国至西晋时期,人水关系比较单一,人们还只是处于简单地利用水的阶段,对于水的认识,还只是刚从“认识了解”转变为“利用”,人水关系处于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人与水之间还不存在矛盾。这一阶段,人水关系受军事、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人们利用和发挥水体军事防御作用的同时,在防御需求不再像战争时期那么强烈时,将军事需求转化为经济需求。三国时为防犯自北南下的魏军,修筑“北海”,后吴国大将陆抗进一步增修“北海”以阻隔晋军。西晋统一后,“北海”的防御作用渐渐减少,对它的军事需要更多地转为经济需要,于是人们将“北海”的部分区域填湖成田,用作农业生产。

隋唐至北宋,人水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由原始的和谐状态开始过渡到人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掌控自然的能力也有所提高,人水关系的主导权由自然过渡到人类手中。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益开始与自然产生冲突和矛盾,人水关系开始恶化。这一阶段的人水关系受经济、军事的交替影响。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社会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发展,国家强盛,人口也不断增多,与没有增加的国土面积产生矛盾。土地资源紧缺之后,“填湖造陆”“围湖造田”等现象层出不穷。于是唐朝时“北海”就被泄水填田,缓解人地紧张的局面。五代政局动荡,作为军事防御的“北海”有过短暂的重建,至北宋统一全国,其军事作用不再重要,“北海”又一次被拆除。

南宋至元,人水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是人水关系有向理性发展的趋势。这个理性因素虽然不能直接协调人水关系的和谐化发展,但足以显示人类在人水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这一阶段,随着经济更进一步地发展,人类活动的加剧,人水矛盾更加突出。受经济、军事的影响,人们会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去选择利用水的不同功能,人们开始权衡对于水的需要哪方面更为迫切。南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面临着外族的不断侵犯,“三海”的防御作用又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在这种军事需

要的主导下,“三海八柜”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代。然而在水关系冲突的背景下,人为填湖占地,对这一工程造成了破坏。随着战争的扩大,局势日益紧张,重修作为军事屏障的“三海八柜”势在必行。至元统一后,“三海八柜”最后一次被泄水填田。

从“三海八柜”变迁过程中折射出荆江流域人水关系的变化,是我国人水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可以说整个古代社会人水关系都没能跳出人水之间的矛盾状态。但是在水关系发展过程中透露出人们的理性选择,能为当今社会人水关系和谐提供借鉴。从“三海八柜”军事水利工程的变迁过程中,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明白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要敬畏自然,更要尊重自然,在不破坏和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地利用和开发水资源,在正确科学的人水观的指导下去审视人类的发

展,最终达到人水和谐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5]魏了翁.鹤山全集[M].四部丛刊景宋本.
- [6]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7]黄建武.长江中游人水关系演变及其特点[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 [8]李宗桂.生态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J].哲学动态,2012(6).
- [9]孙勇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意涵[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责任编辑 周家洪 E-mail:zhoujiahong2004@163.com

(上接第 7 页)

Demise or Usurp?

——Analysis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Myth of Kingship in Ancient China

Jae-Seo Jung

(Dept.of Chinese Literature, Ewha Womans Univ. Seoul)

Abstract: Centered on Yao-Shun demise, Gun-Yu harnessing the water and Cheng Tang praying for ra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lity and mythological prototype of these myths, and compares these myths with some myths outside China and the mythology of the surrounding nationalities. Combined with the social violence before civilizing history, these myths are deconstructed and analyz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Yao-Shun demise is a story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idealism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t Thought of Advocating Virtue, in which the demise is actually a kind of political event that uses force to realize the altern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he myth of Gun-Yu governing the water is a tragedy that conflicts between father and son caused by the struggle of power, resulting in the behavior of killing father. Although the myth of Cheng Tang praying for rain beautify Cheng Tang as the emperor who loves the people, it is in fact very likely that Cheng Tang as a witch monarch to be killed. This understanding enables us to free ourselves from the bondage of imperial lineages and to understand Wang Quan in ancient China from the level of fracture and discontinuity. This can give us new thinking spac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Chinese mythology has not been literalized or systematized, but from the above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western mythology, Chinese mytholog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culture to a large extent, but its level is different. Here,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mechanism, which has been covering up or changing the violent facts such as war and killing, and this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existing Chinese my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Key words: demise; banish; violence; peripheral culture; emperors' genealogy; cultural mechanisms